



北碚党史資料彙編

第七輯

中共重慶市北碚區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北碚党史资料汇编

第七辑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北碚党史资料汇编（第七辑）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唐宦存

地 址 北碚区委大院

印 刷 重庆印制七厂

出版日期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重庆市期刊登记证 072 号

目 录

我所知道的川东特委、重庆市委和北碚

地下党工作情况……………漆鲁鱼 (1)

重庆市委北碚紧急会议的经过……………李维嘉 (6)

我了解的北碚地下党……………林克刚 (8)

我在《嘉陵江日报》工作的见闻……………王荫硕 (10)

忆《文种》……………王洁之 (14)

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学生活动的一些回忆……………苑茵 (21)

我们是怎样去延安的……………拱平 (29)

回忆在夏坝的斗争……………张学真 (32)

我所了解国立二中的一些革命活动……………卞申 (35)

我在相辉学院的斗争生活……………袁伯康 (42)

对天府总公司和天府煤矿上中层

人士的统战工作……………樊恒才 (46)

我入党及与梁漱溟办学的一些回忆……………张倬知 (55)

抗战时期我在天府煤矿的一些活动……………王道一 (61)

在北碚革命活动的回忆……………陈治谟 (65)

解放前夕大明纺织染厂的工人斗争情况……………仇淑静 (71)

曾克先谈在宝源公司的活动……………唐宦存 (85)

我在北碚被捕的前前后后……………曾吉祥（86）
在天府小学脱险及前后的斗争……………张克东（91）

陈莲在北碚……………唐宦存（97）
一个在特殊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唐宦存（102）

关于北碚农民运动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唐宦存（111）
中国劳动协会在北碚的活动……………唐宦存（120）

诗四首

重游天府煤矿……………卢光特（127）
赠友……………郑华（128）
赠友……………李永白（128）
怀念……………唐宦存（128）

来信摘登……………王公维（130）

我所知道的川东特委

重庆市和北碚地下党工作情况

漆鲁鱼

重庆地下党在1936年以前，遭到了严重破坏。1937年10月才由四川省工委批准，成立市工作委员会，作为成立市委的筹备机关。市工委成员四人：漆鲁鱼任书记，陈光（现名杨述）任组织部长，郝文彪（又名郝威）任宣传部长，杜延庆任委员。当时只有一个区委就是北碚区委，复旦大学有支部，支书是沈钧，国立二女中有党员，一个名刘锡琛，一个名卞申。

当时抗战时期，工作是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的，在市工委下有支部。群众团体有：重庆各界救国会（秘密的），下面又分：

（一）工人救国会领导人杜延庆。

（二）学生救国会设委员会，主要成员有刘传基、梁华昌、温士一、刘志刚、刘国定（叛徒，已镇压）。

（三）妇女救国会，领导人陈奇雪。

（四）职业青年救国会，领导人丁雪松、赵湘植、李郁生。

（五）文化界救国会，领导人漆鲁鱼。

统一作了以下各种工作：

（1）救灾运动：1936年春，川东一带旱灾，救国会利用各种名称募捐救济农民。

(2) 援绥运动：日本进攻绥远，救国会开展盛大宣传和募捐。

(3) 追悼鲁迅先生报告大会：救国会会员参加并动员群众参加。

(4) 西安事变的大宣传运动。

(5) 请吴玉章、郭沫若、邹韬奋……等作形势和学术报告。

(6) 召开座谈会批判×××、×××的反动思想，写成文章发表在《新蜀报》上。

(7) 揭露国民党对日帝妥协投降政策。

(8) 反对德、意侵略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当时译成阿比西尼亚）。

在救国会内成立小组过小组生活，主要内容：讨论重庆救国会干事会的指示和文件，学习各种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积极分子中选送一些（分批）到延安深造，如抗大、陕公、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现在这些青年分配到全国各省、市都有。

复旦大学搬到北碚，在该校中也有救国会员如沈钧，国立二女中也有，如刘锡琛（现在大连工学院工作）、卞申。

1937年有一天在重庆街上，忽然有人喊欧阳德（这是我在上海提篮桥西牢的化名），你几时到重庆的？这个人在西牢内名刘增，当时是个党员。我问他，你怎么到重庆的。他说，我在北碚民教馆工作，现在已改名刘忠义了。从谈话中，他还是很向往党的工作。我当时正苦于北碚救国会没领导人，问他愿不愿作救国会会员，他同意。我把重庆救国会情况向他介绍了。经重庆救国会干事会决定，指定刘忠义在北碚负责。

市工委成立后，工委考虑北碚沈钧、刘锡琛已入了党，离重庆较远，有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就决定找刘忠义谈话，恢复他的党籍，这是1938年春的事。

1938年7月，四川省工委改组成两个特委：（1）川康特委（管川西、川北、西康）；（2）川东特委设在重庆（管川东、川南），派廖志高为书记，宋林（真名李应吉）任组织部长，调我去任宣传部长，杨述为青委书记，陈奇雪为妇委书记，甘道生为委员（现名林蒙）。以后我因特务盯梢，在特委会议上辞去宣传部长职务，这是1939年的事，由甘道生接替我任宣传部长。8月重庆成立正式市委，由王致忠任书记。

不久我的党的关系由特委转到南方局，南方局指定《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我联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潘梓年通知我说，周恩来已知国民党对我下逮捕令，要我立即离开重庆找个地方隐蔽，这样我就到西康去了，党的关系在南方局。我在西康住了五年，1946年，重庆来通知要我回重庆。10月回到重庆后，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四川成立省委，由吴玉章任书记，张友渔任副书记，于江震任组织部长，杨超任宣传部长，袁超俊任秘书长，把我调到《新华报》任主笔，总编辑熊复、经理于岗、支部书记是梁华（已死），后来是陈野萍。

在1936年市工委还未成立时，即救国会成立不久，有两个人被捕，一个是杨凡，一个叫赵湘植，被捕原因是乱找人介绍到延安，因此被捕。经审查都不是党员，由他们的工作机关保出来的（赵是川康银行，杨是上海查烟批销处）。

当时救国会也曾钻进坏人，如沈××，他当过救国会干事会下的总务之职，怎样会让他成了会员呢？是沈起予介绍的，他们是兄弟关系，沈起予我早就认识，他是日本留学

生，同“创造社”的郭沫若等有些联系。沈起予从上海返重庆，我到他家去看他，由他介绍才认识了沈××，并说他的思想很进步，希以后常往来。沈××在重庆开了一个旅馆，叫渝新旅舍，我有时也到渝新旅舍去玩，在谈话中觉得他的思想比较进步，曾征求他是否愿为救国会员？他满口同意，工作也还积极。到1938年，发现他已经当了重庆警察局的侦缉大队长，坐起大轿来了，仔细一打听，他曾是黄埔军校学生，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被捕后叛党。但他在救国会期间没做过坏事，虽然如此，我们停止了他的会籍，对他疏远了。

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重庆下决心抓人了。在南方局的指示下，有的党员疏散隐蔽，有的采取单线联系，有的看来不大坚定主动了，就断绝关系。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下令把南京、上海、重庆《新华日报》包围起来，用飞机把我们送往延安。他们的企图是决心攻打延安，并作了军事包围，用此欺骗手段，待攻下延安你们还是逃不脱。

我们走后，听说重庆市委代书记刘国定被捕，当了叛徒，出卖了不少同志。据我所知道的有何贵前（川盐银行工人）、李承林（和成银行练习生），敌人用老虎凳把他的脚杆踩断了，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个名叫陶敬之，陶已知刘叛党，转移到宜昌做生意，刘国定利用陶同事的名字打个电报，说速来重庆，有项利息很大的生意，要陶回渝商量好再返宜昌。陶敬之信以为真，回到重庆就被捕囚入中美合作所……。这些事是1948年我在石家庄工作时，听李思源告诉我的，当时李也是市委工作人员，一听刘被捕，就往解放区走，所以逃脱了。

（漆鲁鱼同志是重庆救国会主要负责人。曾任重庆市工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央卫生部长助理，1957年下放成都任副市长，1974年病逝。）

1970年

重庆市委北碚紧急会议的经过

李维嘉

1948年4月初，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重庆的形势很紧张。为了研究斗争的形势和对策，川东临委委员肖泽宽同志召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和我（重庆市委常委）开会。这个会先准备在冉任职的大溪沟电工器材厂开，冉益智说这个厂情况复杂，不安全，后确定在柏子巷刘渝民同志家里开，因敌人在他家周围活动没有开成。以后，肖泽宽决定，他和冉益智都离开重庆城区，住到郊外去，留我住在市区，并确定在北碚召开重庆市委紧急会议。约定我们三人4月17日中午12时在北碚图书馆书报阅览室碰头，如该处不便，就改在北碚公园的动物园内碰头，然后找地方开会。

4月16日我到达北碚，先去查看了碰头地点，发现书报阅览室来往人员复杂，而公园内的动物园比较安静。17日中午12时我准时到达动物园，肖泽宽也来了。我们三人事先曾经商定，过半小时不到会，就是出了问题。12点半过了，冉益智没有来，我们估计，可能出了问题，但还不肯定冉益智被捕，为了安全，我们两个马上分散转移。

我到北碚是住在兼善公寓，17日的会未开成，当晚我仍住在兼善公寓。旅客登记牌上写的是我的真名李维嘉。第二天，即18日，是星期日（这个日期，我的记忆绝对准确），一早，我乘汽车离开北碚，回重庆才知道冉益智已被捕叛变，早晨曾带特务到我家抓我。

后来知道，冉益智是17日上午在北碚街头，因叛徒余永

安出卖被捕。当晚，他供出了刘国定市委书记身份，刘和冉供出了我，并出卖了《挺进报》的陈然和其他同志，陈然在4月20日被捕，18日我知道刘、冉叛变后曾立即通知陈然转移，遗憾的是，他得到通知后未立即转移，因而被捕。

宣统存整理

于6月

我了解的北碚地下党

林克刚

1936年2月我在北平，经陈大凡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去延安，曾在陕公（陕北公学）和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后在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工作。1939年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经办事处派往铜梁县做地下工作，后到合川。1940年5月到重庆歌乐山，在那里任特支书记。当时宋林告诉我做临时工作，季方把工作交给我后他就走了。同年8月我去昆明，与宋林约好，组织关系转去昆明。1948年再次回到重庆直至解放。这段时间组织关系未转来，但与党组织经常有书信往来，重庆解放后，组织关系也就接上了。

我在四川铜梁县正谊中学教书时，党内没有职务，当时没有说明是党支部或是党小组，只有李鸿光、曾似竹、杨德培和我一起过组织生活。1939年6月、7月，我从铜梁调往合川县做地下工作，是周英（沈钧，合川女中教师，党内任合川中心县委书记）通知我的。当时我和冉启熙（冉益智）一起住在合川青定市街，到这里来的有周远侯（明波），这段时间刘隆华曾召集我和刘其鸣、周远侯等开过一次县委会，宣布我为北碚中心县委委员兼合川县委书记。调合川县委组织部长刘其鸣到合川板桥任特支书记，由陈炳耀接任其职务。周远侯没有宣布职务，不久他就离开了合川。解放后知道他就是前任合川县委书记。据说，沈钧不久去延安学习了，冉启熙不久去北碚，解放后才知道他1948年叛变，解放初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我任合川县委书记时期，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是李亚群，

委员有白戈（江浩然）、刘隆华，刘负责北碚中心县委妇女工作，同时联系合川县委的妇女工作。1939年8、9月卞申曾任合川县委妇女委员，但不久就走了。1940年初，郑铎任县委宣传部长。我参加过一次北碚中心县委会议，参加的人还有宋林（他是代表上级来的）和复旦大学的一个党员。

1940年初，经李亚群、刘隆华介绍，我与合川石龙特支组织委员刘聘珊结婚。婚后，刘调合川县委任妇女委员。

我所知道和能记忆起来的北碚地下党和重庆地下党情况就是这些。北碚党组织没有被破坏过。

1970年2月

我在《嘉陵江日报》工作的见闻

王荫硕

1938年下学期，我在泸县川南师范学校毕业后，经叔父的朋友介绍到嘉陵江三峡实验区工作。卢子英是区长，他用入很认真，要试我的文化程度，叫我写封信给他。1939年2月，我被录用，在《嘉陵江日报》当校对，不久当记者，负责外勤采访。

卢子英在北碚办有《嘉陵江日报》和《北碚月刊》。重要文章他都要亲自审订。当时，国共合作抗日，卢子英是主张抗日的，他聘请了一些得力助手帮他办报。1939年夏天到1940年，《北碚月刊》主任汪伦，是从延安来的，他和党的关系很密切。老党员李洪岗协助汪伦编月刊，报纸的主笔周述亨也是主张抗日的。《嘉陵江日报》副刊编辑李亚群，是北碚中心县委书记。电讯新闻编辑周远侯也是党员，他调去合川后，电讯新闻由周述亨编辑，我编地方新闻。

我到《嘉陵江日报》工作后，在图书馆搭伙，与兼善中学学生陈治谟是同乡。我们经常在一起倾谈思想认识，阅读进步书刊，还和农民银行的同乡一起办墙报。陈治谟与西部科学院练习生共产党员唐建中是同学，通过陈我认识了唐，我们一起谈论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抗日救亡工作，谈论去延安等。唐建中对同志很诚恳，善于帮助人，1939年5月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与五月书店的高孟觉、樊恒才编在一个党小组。当时，党还开展小组活动，过组织生活、学习文件、汇

报情况、研究如何开展党的工作等。我们小组的任务主要是秘密地把《新华日报》、《群众》分送到读者手中。书店有个青年叫丁一，他机智勇敢，为收送报刊做了不少工作。

1939年秋，北碚区委撤销后成立中心支部，书记先是熊伯涛，杨中育来了后，就由杨任书记。委员有我。中心支部分配我联系的党员有电厂会计周玉琴（女）、兼善营造厂周德禄（女）、嘉陵江三峡实验区署财务组谢建堂、吴恒春和西山坪的两个党员。

李亚群在北碚任中心县委书记时，直接领导我，我经常向他汇报了解到的政治动态消息。他每天晚上到报社编副刊，白天搞党的工作，报纸的副刊叫《风雅颂》，他写了不少诗、散文等。有一次，大致是1939年下半年，林语堂从美国回国，申言要到大后方与民众“同甘共苦”。可是到重庆跑了两回空袭警报，就叫苦不迭了，随即到了北碚。但北碚也要跑警报，便自食其言，逃到美国去了。李亚群从我采访中知道这些情况后，一连写了几首诗讽刺他。

李亚群在地下工作中有一些隐蔽的巧妙办法。当时汽车站附近有个迁建区，那里修建了许多专供重庆人疏散的简易住房，人们时来时往，不相问津，是个理想的隐蔽场所，李就住在这里。他最会钓鱼，白天就以钓鱼掩护，接见来谈工作的同志，为了秘密活动的需要，不仅置备了一套钓鱼用具，而且掌握了一套钓鱼经验。无论是晴雨寒暑，他只要一钓，就不会空手回家的。因而，北碚郊外的沟边、河边、池塘边，都是他活动的地方也不为别人注意。有不少人来找李亚群，有基层来的，也有上面来的。曾贵元（曾德林）、郑德远（郑新民）来北碚找李亚群时，在我那里住了几天，以后，曾德林到江北任县委书记，郑新民去《新华日报》

工作。

我在《嘉陵江日报》工作期间，还和南方局的一些领导同志接触。《新华日报》国际版编辑吴敏到北碚治病，住在现在北碚公园后门靠近原江苏医学院的大院子里，他的爱人杨慧敏（新华日报记者）一同来北碚做护理。当时《新华日报》派了一个同志来看望他们，不好找地方住，就与我住在一起。吴、杨夫妇来北碚需要的卧具、用品，都是陶行知提供的，他还经常买东西专门去看他们。我以《嘉陵江日报》记者的身份去访问过，并请吴敏写了一篇纪念“七七”抗战的文章，以秋名在《嘉陵江日报》发表了。

1939年下年，何其芳也到北碚，与李亚群有来往。田汉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穿了国民党的军装来到北碚。田是来检查汉剧团的工作，住在兼善公寓，我去访问过他。

1939年10月大明纺织染厂工人罢工，直接起因是工人生病，厂方不准出厂就医，在门口闹了起来。当场同情工人的群众在激愤下砸了门口办公室门上的一点玻璃，厂方把电停了，不生产了。劳资双方斗争很尖锐，李亚群为这事很费神，当时抗日战争时期，党是不主张罢工的。以后卢作孚从重庆回来了，把职工召集在一起，对厂里不注意工人生活，不准出外看病的作法批评了一通，要厂里改善生活条件、卫生医疗条件等，也没有说要开除工人。卢作孚谈话后，就平息了，但过后又开除了一些工人，这些被开除的工人，有的安排去了“七七”纺织生产合作社或其他地方。

同年，卢子英、陶行知、冯玉祥在北碚搞了一次志愿从军运动。那时，东北义勇军赵桐的妈妈赵老太太住在北碚公园的清凉亭。为动员青年参军抗日，曾召开了一次全区老太太